

● 刘新莽 著

他山之石

中国文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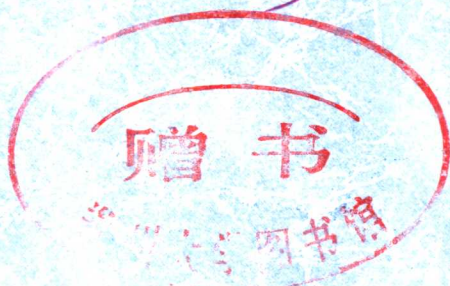
44.628
890



01011203143G 郑州大学图书馆

他山之石

刘新莽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44.628
890

冬

0227/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山之石/刘新舜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3
(珠江文丛/黄金河主编)
ISBN 7-5059-3624-7

I. 他…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2509 号

书 名	珠江文丛(共 11 册)
主 编	黄金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任杰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广东台山市华宁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56 千字
印 张	6.2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624-7/I·2777
全套定价	148.00 元(本册 13.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格 萌 杂 俎

陈年旧事·····	(1)
坦白提纲·····	(5)
铁窗·····	(9)
法国学者谈论钱钟书·····	(12)
“血浓于水”不是中国成语·····	(14)
慷慨不等于富强 富强才受人尊敬·····	(15)
从寄国际信函难说开去·····	(18)
谈谈名片·····	(23)
两者不可兼得?·····	(26)
校徽·····	(28)
世界毕竟前进了·····	(30)
见死不救现象引起的愤慨和忧思·····	(38)
轻歌曼舞的夏天·····	(40)
法国诗人为风派人物画像·····	(45)
我的老师陈述先生·····	(47)

海 外 纪 行

无言的爱·····	(49)
在第二故乡的日子里·····	(52)

漫谈毛里求斯华侨教育	(70)
重访毛里求斯	(74)
毛里求斯世界华人研讨会散记	(78)
曼谷归来话塞车	(83)
普通话在香港和泰国	(86)
境外游散记	(88)
美国的公共厕所	(95)
抗日战争中的非洲华侨	(97)
访美杂记四题	(103)
三访毛里求斯散记	(117)
入境难来过关易	(121)
在毛里求斯过新春有感	(123)
东方之珠必将更加璀璨夺目	(127)
马来西亚散记	(131)
夏威夷散记	(138)
三访花旗之国散记	(147)
三访花旗之国散记 (续)	(155)
加拿大散记	(167)
初游欧洲散记	(176)
普林斯顿大学散记	(189)
希特勒的“最后堡垒”	(195)
美国为军人创造学习条件的院校网	(197)

陈 年 旧 事

非正式学员

尽管把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这一做法后来被批判为“劳动惩罚论”，但在 60 年代末期当干校还是方兴未艾的新生事物时，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入学当正式学员的。

1968 年我被总字 793 部队掌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以“站错队”的罪名摘去领章帽徽放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里批斗了一年多。最后，大概因为定不了“敌我矛盾”的性质，便把我放到“五七干校”。但是，当领导郑重其事宣读将班内 50 名干部调往干校锻炼的命令时，我的名字并不在正式学员名单内，而是在名单后面的非正式学员名单内。

如果说正式学员到干校是受劳动惩罚的话，那么入了另册的非正式学员受的就不仅仅是劳动惩罚了。首先，政治上他们是属于“拉一拉便过来，推一推便过去”的“边缘人物”。因此人们对他们是直呼其姓名而不称“同志”的。听报告、听传达文件，他们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节假日，正式学员可以自由外出，非正式学员则必须请假，获准后才可外出，而且是限定时间的。劳动的时候所有脏活、累活、危险的活都首先交给非正式学员干，他们实在干不过来时才派一些正式学员参加。非正式学员最难受的是随便什么人，领导也好，普通正式学员也好，都可以随时随地训斥他，欺侮他，在

非劳动时间内派活给他干。有一次一个亲戚半大不小的孩子从北京寄了一封信给我。那年头解放军是很吃香的，他家附近有一军事单位，他在这个单位的战士中交有朋友，便模仿战士的做法，在信封上写“刘新舜首长收”（因为我大小是个干部，在战士心目中也是首长）。不料他这一下子可给我带来麻烦了。我们的政委（一位“三八式”干部；自然是无革派喽！）在大会上冷嘲热讽地把我训斥了一通，好像我是在外面招摇撞骗冒充首长。当非正式学员的滋味如何？一位“难友”英语教授概括得好：untold humiliations（数不尽的屈辱）。

“转正”以后

终于有一天我变成了正式学员，不过是不明不白地。既未对我本人宣读什么文件如组织结论一类的东西，也未当众宣布这种变化。领导只是让我出席了过去不得参加的会议，听传达文件，这便算“转了正”。我的处境自然有所改善。不过在某些人眼里始终是“站错队”“有问题”的人，就像摘了帽子的“右派”还是“右派”，只不过是“摘帽”而已。70年代我调回原单位工作，这种“特殊关照”一直维持不变到79年尾，经本人申请转业到地方为止。那时，我的孩子在中学入团也受到我的“株连”。有哪些“特殊关照”呢？让我举个例子。

我曾几次被委以重任，真是受宠若惊，却又有苦难言。一次是被指定为救生员。我连驻地有一个很大的人工湖，湖底高低不平（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有一“五七战士”下去洗澡，不料一脚踩到深处，他不会游泳，结果遭到灭顶之灾。事后领导指定两三个人为救生员；本人游泳技术并不高明，居然也被看中。因事关人命，在深感荣幸之余，不得不向领导坦陈：我的游泳技术实在不能胜任救生员这一要职。领导说：“我们知道你在印度洋中游过泳（注：本人

系从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岛回来的华侨),是能够胜任的。”首长此言已出,我不敢再推辞,因为在那个年代一言一行都可以上纲上线到可怕的高度,只好有苦难言把任务接受下来。我心里想,真的出现溺水的情况,我豁出去了,我当然要下水去救,大不了被他拖住一起见龙王。我命都没有了,你总不能再给我上纲上线吧。你要上,我也不知道了。当时没有考虑到,如果真的那样,爱人和孩子可能要倒霉。幸而后来没有出现需要救生员出动的情況。

第二次是干校要架设从校部通往各连的高压电线,便从各连各抽一人到校部电工组参加劳动,鄙人又被选上。我们是当小工,每天干的是野外挖坑、搬运水泥杆、树立水泥杆、架导线等粗活重活,并不是室内修理安装电灯、维修电动农业机械等技术活。因此我虽然在电工组干了几个月的活,对修理电灯、电动农业机械等活都并未沾边,仍然是外行。不料回到连队以后,领导又以我是“从电工组回来的”为理由,指定我为本连电工。我又有苦难言,你向他解释彼电工非此电工也,他听不进去。你再解释的话,他会说你不服从组织分配,有私心杂念,上纲上线。于是我这个外行只好服从分配当起几乎一窍不通的电工来。与此同时我赶快买有关电工的书来看。边学边干,边干边学。连里也真有人要我去修电灯,接电源。我也真的扛着一把梯子在室内室外爬上爬下,并且还曾穿着电工鞋爬水泥杆。我那时已有40多岁,爬水泥杆心跳气喘。说也奇怪,我居然瞎猫逮耗子似的修好了一些人家的电灯以及其它一些电路障碍,又居然没有触电烧伤烧死。真得感谢上帝,阿门。

第三次是:我连为了用汗水洗私心,学习总后五七学校的先进经验,有拖拉机不用而用人和牛去耕田。有一天领导叫我使一头水牛去翻地。在这以前我从未使过牛,是百分之百的新手。但出工之前领导没有让会使牛或多少有点经验的人教一教我,哪怕示范一下也好,也没有嘱咐要注意什么。他分给我一头牛便让我牵

着牛干起来。大家知道,牛是会欺生的,它不听我指挥,随意乱走,我控制不住它,结果犁撞在我的左胫上,当即皮开肉绽,血流如注。伤疤至今清晰可见。不幸中的幸事是胫骨未被撞断。我买过不少彩票,可从来没有中过奖,连奖金5元的末奖也没有得过。而我周围的人得过奖的可不是个别的。因此我自认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但从以上三件事看来,我的运气也不是那么坏。因为这三件事虽然不算“大难”,可的确确实潜伏着灭顶、触电、断腿之灾。我能以较小的代价度过,真是走运,值得庆幸。

一件“趣事”

有一次连队养的猪生病(大概是猪瘟)死了。从连长指导员到“五七战士”都不敢叫伙房杀了做菜给大家吃,于是养猪的同志挖坑把它们埋了。吃肉问题怎么解决呢?只好由食堂采购员拿钱去买。我们养猪排有一个技术顾问,是本地人。他原来是劳改农场的工作人员(可能是兽医),农场停办移交给我们部队办干校时,干校领导把他留下来指导我们养猪。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彼此比较熟悉了,谈话也比较随便了。于是他向我们透露:前些时候我们病死的猪埋在地里之后,夜里附近的老乡们把它们挖了出来,收拾干净之后又卖给我们伙房了。我们那些天吃的花钱买来的肉原来就是自己连里病死的猪的肉!!!

(《随笔》1991年第4期)

坦 白 提 纲

我年轻时读书遇到的“坦白”一词都是当形容词用的,如说张三坦白,是指他对人真诚、说实话。这样用的“坦白”是褒不是贬。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亿万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运动中经常出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口号,“坦白”成了动词,被广泛运用。由于是坏人(其中有些是打引号的)才需要坦白交代问题,因而“坦白”成了贬义词。使我对“坦白”一词留下深刻的是一次运动中领导发给我的一份“坦白提纲”。

那是在1951年开展、1952年结束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运动的重点本来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和经手钱财的干部。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也揭露出一些不是掌管钱财的干部贪污的事实,如政治指导员贪污党费,打字员多报打字机维修费等等。于是,上面发下话来:“经手钱财的人没有不贪污的”,都要审查,都要交代问题。那时贪污一个亿的(等于现在的一万元;旧人民币一万元等于现在的一元)被称为“大老虎”,1000万以上的被称为“中老虎”,1000万以下的为“小老虎”。“大老虎”很可能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如曾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和公安部行政处长的宋德贵。那是报纸公开报道过的。党政军各单位由上至下层层下达指标,必须在运动中打出多少只“大老虎”,多少只“中老虎”……来。我那时在北京西郊军委某部担任法语教学工作,培训一批年轻的老干部,既不是领导也不经管钱财,本来不

应该是运动的对象。但是,由于我在教学之余还兼做法文图书资料的采购工作,多次进城到王府井大街的国际书店、台基厂的法文书店和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的旧书店、书摊买书,共值 700 万元左右;因此,在我们那个小单位里我也就成了运动对象。不过,因为我心里无鬼、态度坦然、单据齐全、帐目清楚,贪污的嫌疑不大,所以领导和群众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没有摆出“打老虎”的架势。但是,在运动高潮中会上也免不了有同志含沙射影暗示我有贪污嫌疑的,如当我面说:经手钱财的人,不管数目大小,没有不贪污的。但是,我买的每一本书,每一样东西(如唱片)都有发票,没有什么可疑的,领导想必也已经派人到各书店、书摊查证过,所以我并不害怕。倒是查帐的同志用算盘打来打去,这一次加起来的书款总数和下次得到的总数老是不一致而显得烦躁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领导发给我一张印刷精良的表格(是用平时难得见到的优质白纸印的),上方印着“坦白提纲”四个大字。初一看吓了一跳,因为只有犯有贪污罪的人才需要坦白,我没有贪污,怎么让我坦白呢?我觉得人格受到侮辱,感到委屈。因为我不但没有贪污,而且每次进城买书中午要在外面吃饭,公家每顿饭给报销 4000 元(即现在的 4 角),根本不够,自己还得贴钱才能吃饱(那时我们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供给制,每人每月只能领到 7000 元的津贴费)。再说,我的职务是教员,采购图书并非我的本职工作。

“坦白提纲”向填报人提出许多问题,如“你有没有钱存在资本家那里?”“资本家有没有请你吃饭?”“资本家有没有送东西给你?”“你有没有同资本家合伙做生意”等等。我一口气一连写了许多个“没有”,签了名,便把这份提纲交上去了。后来,一直到运动结束,倒也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人对日宣布审查结论。我也就慢慢地忘了这事。不料两三年以后,在给我看的“军衔鉴定”(征求意见稿)中写道:“经手过 700 万余元,经‘三反’中审查,帐目清楚,没

有问题。”我心里想：好家伙，还写进档案了！不过，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觉得这是一个公正的、符合实际的结论。

如果说，没有贪污、没有犯错误却收到一张“坦白提纲”而且不得不填写，因此感到委屈、人格受到侮辱的话，那么看一看其他几个人在运动中的遭遇，我便感到自己是幸运的。

我所在那个部的部长，在运动中因为“有问题而又态度不好”受到停职反省的处分。这个处分一宣布，他便被关进平房的一间小屋里交代问题，门口有战士看守，生活待遇由小灶改为大灶，头发长得长长的。到了运动后期，像其他在运动中受到停职反省处理的干部一样，他受到降一等三级的处分，由正军级降为正师级，转业到北京市，在一个区里当领导。另一位，跟部长一样，也是长征干部，是这个部的办公室的副主任，在运动中被认为是个“大老虎”。我参加过斗争他的群众大会，在会上我也跟着大家喊过“××赶快坦白”的口号。后来他在大会上交代：为了采购物资器材，他到过广州，在广州他同香港的一个叫做张××的资本家见过面，这个资本家送给他一个有一万港元的存折云云。除了交代自己的问题之外，他还检举揭发了他的部下，一个跟他到广州并且还去过香港采购物资器材的、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技术干部。这个领导干部的坦白交代和检举揭发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悔改、立功赎罪的表现，受到领导和群众的欢迎，他的日子也就好过多了。但是，那位被他检举的知识分子新干部却因为没有坦白交待而被当作抗拒从严的典型，在大礼堂举行的全部人员大会上被宣布逮捕法办。他被摘去帽徽、领章，戴上手铐由两名战士押上吉普车送往军法处。大约半年以后，他又回到原单位工作，究竟有没有问题？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只知道后来他一直在部队工作，军衔、级别未受影响。检举揭发他的那位领导干部倒是由于在运动中受过停职反省的处理，由正师级降为正团级（或由副师级降为副团级，记不清楚了，但确实是降了一等三级），职务也降了。至于香港资本家、港

币存折云云,听说并无其事。

人们一般认为,建国后极左路线从 1957 年反右开始。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在“三反”运动中已经显露锋芒,只不过同后来的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相比较,打击面没有那么大就是了。

(《随笔》1989 年第 4 期)



铁 窗

来到广州六年了,在这六年的时间里广州真是盖了不少的高楼大厦。就拿我们暨南大学校园的一角来说吧,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刚来时,西北方向靠围墙的地方有一个池塘,里面种的是拿来喂猪的水浮莲;如今,池塘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四幢六层高的教职员工宿舍。

这些新盖的楼房给我最新鲜和最深刻印象的是它们的窗子,至少是客厅的窗子。这些窗子,几乎毫无例外,从一层楼到六层楼都装有铁条。这些铁条,有的是传统的,坚直的,不怎么美观的;有的是新式的,波浪纹的,不那么难看的。但不管安的是哪一种铁条,这些窗子都是不折不扣的铁窗。

小时候在香港,偶尔也拿起父亲带回家来的报纸看一看,常常看到社会新闻内有“梁上君子饱尝铁窗滋味”一类的字眼,知道铁窗滋味不是好尝的。铁窗乃囚禁犯人的监狱之委婉称谓也。

那末现在我们这些奉公守法,享有公民权利的自由民为什么心甘情愿自找铁窗滋味来尝呢?有些旧房子原来没有铁窗的也要自己花钱请人装上一个呢?那是因为铁窗还有一个功能,它能够保障房子里面的人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免受小偷、强盗的侵犯和伤害。因此,人们虽然知道铁窗并不那么美观,而且遇到火灾、地震等紧急情况时还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但权衡得失、利弊,还是宁愿装上铁窗。

从一九四九年夏天到一九六〇年初春十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北京，亲眼看到无数的楼房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那时的北京，即使不能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治安良好却是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公认的事实。我曾多次夜间看完演出，一个人从天桥剧场骑自行车回到香山，每次都平安无事。因此，那时盖的房子，即使是在一层，都不安装铁条。当然，某些机关，尤其是机要部门和财务部门的办公室和保密室乃是例外。

王府井大街有一家很大的新华书店，一家专卖美术工艺品的大商店，它们的橱窗里摆着琳琅满目的中外图书和美术工艺品。晚上商店关门之后，橱窗里仍亮着电灯，过路的行人如果不是匆忙赶路而是从容漫步的话，还可以透过明净的玻璃欣赏橱窗里那些精美的书籍和工艺品，就象参观美术馆和展览会似的。其实，又何止这两家卖书卖美术工艺品的商店是这样。许多商店，如王府井百货大楼，也都是这样。夜间，橱窗亮着灯，让行人欣赏本店销售的商品。

不寻常的一九六六年，那场据说目的是为了净化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出发席卷全国。人们开始在自己住房的窗户上安装铁条。起初只是住在一层楼的人们安装。后来呢，“逐步升级”，二楼、三楼、四楼……的窗户也安上了。由于是个人的行动，因此规格不统一，不整齐，不美观；而且各人分散去装也很麻烦。索性由建筑部门包了吧，于是便有了今天整齐划一的从下到上每一层楼都装有的铁窗。北京王府井大街各商店的橱窗外面也安上闸门或加上了诸如铺板一类防盗防破坏的设施。从七十年代中起，晚上七、八点钟以后在王府井大街走过再也看不到亮着电灯的橱窗里的工艺品和其它商品了。夜间，整条王府井大街也不那么灯火辉煌令人心情轻快了。美的享受没有了，眼福不能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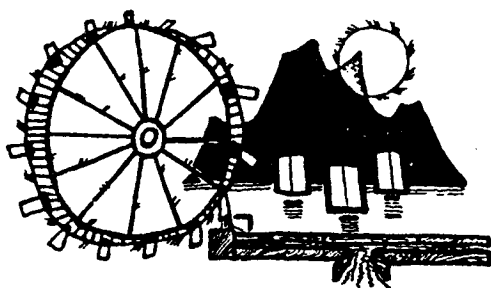
在“四人帮”控制下，新闻媒介天天讲“形势大好，越来越好”，

但人们的安全感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自愿”饱尝铁窗风味,越来越多的人安装铁窗铁门不就是明证吗?纸是包不住火的,谎言是掩盖不住事实的。

“四人帮”已经覆灭九年了,但它的后遗症并未消除干净,小偷盗贼远未绝迹。因此,建筑部门从社会实际出发,考虑到住户的愿望和需要,在施工时就统一安装好铁窗,免去各住户搬进新房后的操劳乃是值得欢迎的便民之举。

但是,笔者祈望:广州——乃至全国——的高楼大厦盖得越多越好,因为它们表明我们的物质文明越来越多;而笔者也祈望:铁窗安装得越少越好,因为它们表明我们的精神文明越来越少。

(随笔 1986 年第 3 期)



法国学者论钱钟书

最近从法国《世界报》(1987年2月,国际版)上读到一篇评介我国钱钟书先生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并摘译如下,供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文章标题为《钱钟书的被发现》,署名阿兰·佩罗伯。

“一位伟大的中国作家刚刚被显示在法国公众面前;钱钟书。这既不是一位年轻的先锋主义作家,也不是当前在中国文坛占据显要地位的‘50岁左右那一代’的代表,他不过是一位77岁,早在40年代就已经活跃的人道主义文人。从今以后,在西方,他的名字配得上跟鲁迅、茅盾、老舍或巴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汉学家们很久以前就知道钱,而且西蒙·莱斯在1983年就曾经评价说:如果人们想把诺贝尔奖金颁发给一位中国作家的话,只有钱钟书配得到这个荣誉,因为‘他是一位天才作家……他的作品的质量非同一般’。但在当时,连一本(他的作品)的法文译本也看不到。现在,这个空白得到了填补。克里斯蒂昂·布古瓦连续发表了《围城》和五篇论诗学的论文。

“钱钟书博学多才,既对西方文学遗产也对中国文化宝库,有深刻的了解,这两点不断地诱导读者去作大胆的对照和出色的分析。这是专家当中最伟大的一个在传授文学批评的基础知识;如果不利用这个机会从中得益,那将实在是令人遗憾的……”